

跨过苏伊士运河

[埃及]萨阿德·沙兹利中将 著

山 鹰 译

解放军出版社

Lt General Saad el Shazly
THE CROSSING OF THE SUEZ

American Mideast Research
San Francisco 1980

跨过苏伊士运河
〔埃及〕萨阿德·沙兹利中将 著
山 鹰 译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邮政编码100035)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京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75印张 插页 6 184千字
1981年10月第1版 1991年4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31001—41000
ISBN 7-5065-1676-4/E·891
定 价: 4.00元

目 录

序	1
引言：障碍	6
第一章 东山再起	9
第二章 制订计划	14
第三章 重建部队	40
第四章 政治日记	94
第五章 暴风雨前的平静	216
第六章 战 争	237
第七章 伸出援助之手	295
第八章 后 果	306
第九章 谁的责任？	317
后 记	332
附 录 对萨达特召集的会议的评论	334
注 释	336

序

本书是一部军事回忆录，记述了我在一九七三年十月阿以战争中担任埃及武装部队参谋长的经历。就我所知，在当代阿拉伯指挥官中，这样的回忆录尚属绝无仅有。我是怀着勉为其难、万分遗憾和恼恨不已的心情撰写此书的。我主要是恼恨目前身为埃及总统的那个人，因此不难理解，作为毕生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军人，我本来不愿意拿起笔来揭露一切，并为最终不得不这样做而遗憾万分。

关于一九七三年的战争，已有不少著作问世。那么，为何还有如此之多的真相仍被隐瞒着呢？在这些著作中，为何又有如此之多的歪曲事实和颠倒是非之处呢？原因之一当然是作者们不知实情。然而，还有更深刻的原因。正如我将揭露的那样，有人蓄意展开了一场隐瞒战争真相的宣传运动。作为头一个例子，我们不妨问一问：下述问题为何迄今仍无答案？

一、埃及武装部队胜利地渡过苏伊士运河之后，为何不向东发展攻势，并立即占领西奈半岛各山口？

二、人们一直传说，埃及统帅部曾经预料敌军将在德维斯瓦地区渡河西进（所料不差分毫），并且业已拟妥粉碎敌军企图的计划。这一传说是否属实？我现在证实，所传属实。那么，埃军为何未曾实施预定的反击？

三、埃及武装部队为何反而让向西突进之敌日益得逞？正如我将说明的那样，答案是：应付西进之敌的计划一再遭到政治领导人，特别是安瓦尔·萨达特总统及其国防部长艾哈迈德·伊斯梅尔·阿里将军的否决。

四、谁应对埃及第3军团的被围负责？是军人们，还是政客们？

五、该军团被围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对战争结局造成的影响有多深远？这不仅是指对埃及造成的后果，而且还指对整个阿拉伯世界造成的后果。

* * *

在战前和整个战争期间，直到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为止，我担任埃及武装部队参谋长两年多。换句话说，我知道答案，尽管我从未打算公布这些答案。但在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亦即当我先后在伦敦和里斯本担任大使期间，有关这次战争的报道越来越使我厌恶。敌人撒谎并不出我意料。可是，我们自己的领导人居然也撒谎！

当然，其中含有个人成分。开罗的那些自称透

露战争内幕的人，似乎主要致力于诋毁我这个参谋长所起的作用。我个人并不介意，而是心安理得地相信世人自有公断。使我厌恶和恼火的是，这种对个人的攻击竟然肆无忌惮地发展成了彻底歪曲整个武装部队的丰功伟绩。长达几年之久的精心制订进攻计划的工作被一笔抹煞。为了渡过运河而进行的费尽心机的准备和专心致志的训练被一笔带过。在将一切成就归功于某人领导有方的阿谀奉承声中，渡河中的英勇事迹被置诸脑后。当这些消息灵通人士谈到如何对付以色列突入运河埃及一侧的行动时，他们竟然堕落到了公然扯谎的地步。他们只字不提我在十月十六日是怎样就对付以军突破的办法同总统进行争论的，也不提我们的计划是怎样一次又一次地被总统或其国防部长拒绝的。相反，为了推卸造成这次灾难的责任，总统及其助手们力图诿过于我，而且很快扩大到我有幸领导过的那些勇士们。

一九七六年十月，经过三年的颠倒黑白之后，为了给这些勇士们恢复名誉，我决定撰写这部回忆录。我手头的官方文件为完成这项工作提供了帮助。一年后，一九七七年十月，初稿写成。

我犹豫不决。我明白，如果发表，就会同萨达特总统发生对抗，而我当时还不想进行这种对抗。我也不希望做任何可能妨碍真诚地媾和的事情。因

此，我在里斯本忧心忡忡而又胸有成竹地耐心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总统尔后的行动证实了我的担心。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他对以色列进行了一次十分糟糕的访问，作出了许多让步而一无所得。一九七八年四月，他成了第一个在任职期间就发表回忆录的当代国家领导人，因而享有盛名。但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即使用这类著作放宽了的标准来衡量，他的回忆录也显然是为其私利服务的：埃及的每一项成就似乎都是他个人的功劳，而每一次失败则都是别人的过错。最后，一九七八年五月，萨达特发起了对其政敌的镇压，作为扼杀对其政策日益强烈的批评的唯一办法，从而使全埃及都看到了这种利己主义的必然恶果。我断定，这是我说话的时候了。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九日，我发动了我的第二次突然袭击*……公开反对萨达特，并且辞去了我的职务。从那时以后，我一直没有踏上埃及的国土。

*

*

*

我谨将这部回忆录奉献给埃及武装部队的将士们。这是一部记述他们的英雄业绩的著作；它终于道出了他们获胜的真相。我担任他们的参谋长而度过的每一天，都值得自豪。阿拉伯对以色列发动的第一次胜利的进攻，是在我的任期内计划和实施的。

* 第一次突然袭击是指一九七三年十月埃军跨过苏伊士运河。——译者注

对此，我也感到自豪。

我歌颂每一位参加这次进攻从而恢复了埃及军人自豪感的将士。他们是我揭露的事实真相的见证人。书中字字句句都有文件为证。唯有埃及军人知道全部真相——有些事情为数以千计的人所知，有的为数以百计的人所知，而某些方面的情况则只有很少几个人知道。只有那些卖身投靠萨达特总统的人（有些人是名符其实地卖身投靠）才会否认真相。对于他们，我不屑一顾。

愿真主保佑和指引我们走上正路，给予我们不顾一切地说出真相的勇气吧！

萨阿德·沙兹利将军
一九七三年十月阿以
战争期间埃及武装部
队参谋长

引言：障碍

首先研究一下面临的障碍。对于一支现代化陆军说来，江河并不足惧。水陆两用坦克和装甲输送车可以充当突击的先锋，在对岸建立桥头阵地。还可以运来舟桥部件，卸下后连接在一起，于几分钟之内在预定地点架设完毕。等到军队主力抵达时，渡口业已准备就绪。

然而，苏伊士运河却与众不同。其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构造使两栖突击部队面临了许多困难，而且敌人还在天然障碍上构筑了大量防御工事。运河的宽度只有一百九十五至二百二十码。但是，凡是见过它的人，都把它视为不可逾越的障碍。

头一个障碍是：运河是用人工在沙土上开凿出来的一条水道，而沙土又易受侵蚀。为防止侵蚀，河岸镶砌了水泥墙，墙顶露出水线，墙脚深深埋入河床。河水还有潮汐现象。高潮时，河水从水泥墙顶端下方一码处流过。低潮时，水面距墙顶两码（南段为三码）。水陆两用车辆不能象拉布拉多猎犬那样从高度为一码以上的河岸上跃入水中；至少不能不冒严重风险就跳下去。即使跳下去了，它们又怎能

爬上对岸呢？

第二个障碍是敌人沿整个东岸垒起的庞大沙丘。在六年的时间里，以色列的推土机孜孜不倦地聚沙成垒。当然，功夫下得最大的地方是可能的渡河点。那里的沙垒高达六十英尺，而且上下几乎一般宽。（沙堤坡度因沙土的稳定性不同而自四十五度至六十五度不等。）这道障碍紧挨着运河，其西坡（面向我突击部队）则与更陡峭的水泥河岸连成一体。

在这道令人生畏的障碍上耸立着第三道障碍：巴列夫防线上的三十五个要塞。这些要塞筑有坚固的工事，掩蔽部可以经受住威力小于千磅炸弹的任何武器的袭击，并且能向四面八方射击。每座要塞均有地雷场和带刺铁丝网予以保护，而且储有足够的给养和弹药，可在被围后坚守一个星期。平均每隔三英里就有一座要塞，但在可能的渡河点上，要塞比较密集，相互间隔仅一千码。只有一个步兵旅驻守所有的三十五个要塞。为了增援守军，以色列拨出了三个装甲旅——三百六十辆坦克。这些坦克将进入要塞之间的射击阵地（相互间隔一百码）。沿整个沙堤筑有两条公路：一条在堤顶，另一条在堤后。敌人可在我们的视界之外调动装甲车辆，前往加强突然出现的弱点。敌人若在我方发起突击前及时将坦克调到沙垒上，即可用机枪和反坦克火力横扫整

个正面。假如我们的士兵勇敢地冲破一切障碍而进入西奈半岛，那么要过多久才会遭到反击呢？这取决于我们给了敌人多长的警报时间。根据运河彼岸敌军装甲部队的部署情况，我们估计，敌人也许能够在十五至三十分钟之内发起坦克连和坦克营规模的反冲击，而且至迟在我们发起冲击后的两小时，即可实施装甲旅规模的反击。

但是，我们怎样才能渡过水障呢？第四个障碍是一种秘密装置。敌人在沙垒深处埋设了一些储有易燃液体的大罐，排放管道的开关由最近处的要塞控制。几分钟之内，这种液体就可以涌入运河，把河面变成人间地狱。

这就是障碍：运河和敌人的防御配系。敌人已让来自世界各地的军事专家参观了这些障碍。专家们都一致声称障碍不可克服。我们的任务就是克服这些障碍。

第一章 东山再起

我们的意志一向未曾消沉。即使在一九六七年战败后的惨淡岁月里，我们也盼望着有朝一日发起进攻，歼灭侵占我国领土的敌人或者将其驱逐出去，因而保持了高昂的士气，促进了战后的恢复工作。可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要等六年之久。

为什么要等？原因之一是，在六年之中，我们有两年陷入了同以色列之间的一场战争，即所谓的“消耗战”。这场战争很少成为国际上的头条新闻，但是却使我们付出了数千人的生命和数千万英镑的代价。我不打算复述这场战争的历史，因为在我就任参谋长之前，象征性的停战已经生效了将近一年。然而，这场战争的痛苦教训，以及一九六七年的教训，对我们十月突击的计划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我至少要扼要地罗列一下主要的事件。

我们在一九六七年六月战败后的几个星期之内，就在苏联人的帮助下开始重建武装部队。到一九六八年九月，至少地面部队已经恢复到足以向运河东岸的敌军挑战的地步。于是，开始进行消耗战。从军事上讲，我们的目的是提高因惨败而受到沉重

打击的军队的士气，以及给向来经不起损失的敌人造成伤亡。我们的计划是炮击东岸敌军前沿阵地，以及利用夜暗派遣突击队深入被占领的西奈，伏击敌军坦克和卡车。

起初，我们的炮击和袭击收到了良好效果。但是，敌人进行了报复，派遣直升机机降分队深入埃及内地，炸毁重要目标。上埃及的纳贾哈马迪电站就是目标之一，其他目标则是我国水利系统中的重要枢纽。我们被迫放弃了袭击。然而，为了显示不愿永远处于战败地位，我们需要有所作为。于是，五个月之后，亦即一九六九年晚春，我们又被迫重开战端。敌人的反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一九六九年七月，以色列空军投入战斗。

以色列飞机很快就摧毁了我国北部的防空配系，在伊斯梅利亚和塞得港之间打开缺口，形成一条敌机可以长驱直入尼罗河三角洲的走廊。不久，我们就看到了这种空中优势会造成什么影响。

一九六九年九月九日，一支由十辆坦克和数辆履带式车辆组成的登陆队越过苏伊士湾，在离扎法腊纳港不远处登陆。在持续将近一整天的袭击中，他们摧毁了防御设施、对空观察哨和当时恰好在沿海公路上行驶的所有车辆。扎法腊纳不是什么重要目标。那里的驻军很分散，其任务与其说是击败敌军坦克的进攻，不如说是进行日常的观察活动；从他

们的装备来看，则尤其如此。他们只有轻武器和射程不超过五百码的反坦克炮。敌人的坦克从将近二千码远的地方，把他们一一收拾掉了。武装部队参谋长立即被纳赛尔总统撤了职。然而，这不仅仅是个人的失败。除了对敌人具有宣传上的价值以外，这次袭击的意义还在于：从海岸到海岸，一个来回花了大约十二个小时，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敌人掌握了绝对的空中优势，埃及没有一架飞机或一艘舰艇敢于与之挑战。

随着敌人加紧空袭我国纵深地区，灾难达到了顶峰。我们的防空配系瓦解了，敌人甚至开始不受惩罚地袭击民间目标——工业中心、工厂乃至儿童们的学校。我们的地面部队衰弱到了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高炮进行防御的地步。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大概是为了显示一下绝对优势，敌人在我们的红海海岸登陆，袭击了一座孤立的雷达站，拆下设备，装上专门调来的直升机，然后将这些战利品运回以色列。

一九七〇年一月，纳赛尔总统秘密地前往莫斯科，要求苏联直接插手我们的空防。苏联人表示同意。整个二月和三月，他们的人员和装备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源源不断地抵达埃及，计有：八十架米格-21 截击机，二十七个地对空导弹（萨姆导弹）营，成批的电子装备（用于干扰入侵敌机上的电子器

材)，四架米格-25 高空侦察机，以及使用这些装备的人员。总共调来了苏联的两个航空旅和一个防空师。苏联人的任务纯粹是防御性的——保护我们的心脏地带。苏联人的出现，减轻了我军空军的防御负担，使我们得以集中力量恢复空军的实力。苏联人只负责内地的某些地区，埃及负责防守其他地区，包括运河和苏伊士湾以西十英里宽的地带。

同年四月，苏联的装备已经完全可供作战使用。到四月十八日，埃及有俄国人一事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苏联的飞行员首次与入侵的以色列飞机发生接触，并且追到了西奈。在此过程中，他们用俄语通话，并且立即被以色列和美国的侦听站发觉了。以色列停止了渗透袭击。消耗战第一阶段宣告结束。一九七〇年一月一日至四月十八日，敌方空军一共出动三千三百架次，在我们的领土上投弹八千吨。

我方幸存下来的防空部队终于能够进行改编和加强了。首先是加强运河以西仍归埃及负责的十英里宽的地带。优先加强那里的防空力量，不仅仅是出于民族自豪感。跨过运河的准备工作将集中在这个地带内进行，突击部队亦将在那里集结，这就是该地带为何如此重要的原因。在一九七〇年六月的最后几天内，我们经过整编的防空部队在夜暗的掩护下将萨姆导弹前移到这一地带。消耗战的第二阶段开始了。

我们很快就取得了成效。一九七〇年六月三十日，我们的萨姆导弹击落了两架入侵的 F-4 型敌机。在七月份的头一个星期内，击落了十架入侵的敌机，其中七架掉在我方领土上。那位埃及农民* 立即在日历上写下了“击落敌机的一周”几个大字，以资纪念。这一胜利令人欢欣鼓舞，标志着我国防空兵的新生，并且开创了导弹和飞机作斗争的新时代。当时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任何一场这样的冲突中，胜利将属于拥有更先进的电子探测、干扰和抗干扰装置的一方。

在这种不稳定的基础上，到一九七〇年七月底，双方同意在苏伊士前线停火。这只是暂时的和局。发动一次新突击的准备工作可以着手进行了。其基础必然是重建我们的地面部队。

* 指纳赛尔总统，因为他是上埃及的贝尼·莫尔人，那里的人被人们看成是“把报复看作天经地义的农民”。——译者注

第二章 制订计划

重建工作开始了，而且必然是从最上层开始。从一九六八年秋季起，埃及武装部队总司令部每年都举行战略演习，目的是在尽量酷似实战的条件下重新训练总司令部及其下属各大司令部——空军司令部、防空司令部、海军司令部、各军团司令部、特种部队司令部、红海和其他军区司令部等等。（演习持续一个星期，一般由国防部长担任演习总指挥，总统有时也到场。）我在一九六八年和一九六九年作为特种部队司令，一九七〇年作为红海军区司令，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作为参谋长参加了演习。一九七三年的战略演习有点儿言过其实。我们宣布这次演习将从十月一日开始，并象往常一样持续七天。其实，它是欺骗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演习显得不真实。一九六八年，我们显然无力进攻各方面都占优势的敌人，而这些演习却假设我们拥有的人员和器材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冷酷的现实。这种假设是合乎情理的。因为，这样一来，在演习中，指挥官的计划和决心虽然可能很少符合当时的情况，但是随着我们力量的